

# A Review of Emperor Shizong of Jin and the Dading Governance

金世宗与“大定之治”研究述评

Peng Shi a,b,\*

<sup>a</sup>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 KEY WORDS

*Jin Dynasty;*  
*Emperor Shizong of Jin;*  
*Dading Governance;*  
*Historiography*

## 关键词

金朝；金世宗；大定之治；学术史

## ABSTRACT

The Dading Governance represents a pivotal era of sustained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under Emperor Shizong of the Jin dynasty (1161-1189). Current scholarship predominantly clusters around three analytical axes: (1)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 of the emperor's personal attributes and his historical milieu, (2) discrete investigations into pivotal events and sociopolitical phenomena during the Dading reign, and (3)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rough governance paradigms, particularly their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and societal ramifications. Through systematic historiograph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Dading Governance's dual significance as both a defining juncture in Jurchen statecraft evolution and a transformative phase in China's medieval political ecology. Furthermore, it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with other Northern dynasties' administrative models, thereby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non-Han regim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premodern China.

## 摘要

“大定之治”是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期间（1161-1189）出现的稳定繁荣局面。学界目前对于金世宗与“大定之治”的研究，多集中于整体上探讨金世宗本人及其时代、专门研究世宗时期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从“治理”角度分析金世宗的种种政策作为及其成效、影响。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评述，可以发掘“大定之治”在金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为中国古代北族王朝的“治世”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 1. 引言

时至今日，关于金世宗与“大定之治”的相关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金世宗本人及其时代的整体论说；二是以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种历史现象为中心的专门探讨；三是从“治理”角度分析金世宗的种种政策作为及其

成效、影响。以下选择这三个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分别进行回顾和梳理。

## 2. 对金世宗及其时代的整体论说

对金世宗的论说和评价古已有之，如南宋大儒朱熹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873419469@qq.com](mailto:873419469@qq.com)

及元修《金史》等称其为“小尧舜”<sup>[11]</sup>，清代学者赵翼谓“金代九君，世宗最贤”<sup>[2]</sup>云云。不过，以上诸说仍未免带有浓厚的传统帝制王朝色彩，直至改革开放后，对金世宗的评价才逐渐走向系统、深入，除了某些通论性及断代史作品外，有许多对专门性成果问世。杨启《略论金世宗》<sup>[3]</sup>一文对世宗与民休养生息、促进民族融合、抑制豪强地主势力和整顿吏治等方面做出的成绩予以肯定；王宏志《金世宗的历史地位》<sup>[4]</sup>一方面承认世宗在稳定政局、促成南北和约议及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贡献，又指出其实行着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刘肃勇的《金世宗传》<sup>[5]</sup>和《论金世宗完颜雍》<sup>[6]</sup>一文全面评价了金世宗及“大定之治”，作者指出，世宗在位时期，国中出现盛世景象，但其晚年政绩不佳，亦出现诸多短板；朱子方《金世宗简论》<sup>[7]</sup>评价世宗是受儒家思想培育的封建帝王、女真族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和逆潮流而动的失败家；董克昌《谁是“小尧舜”》<sup>[8]</sup>一文对崔文印《略谈金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问题》中，对“小尧舜”之称当属海陵王的说法予以回应，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金世宗“小尧舜”之称当之无愧；汪冰凌《金世宗其人及其传说》<sup>[9]</sup>对世宗一生的主要作为，及史籍中有关世宗的传说有所论述；王德忠《也论金世宗的历史地位》<sup>[10]</sup>一文将世宗置于12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形势的大背景下考察，指出其既要谋求国家发展，但自身又阻碍了国家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王德忠《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sup>[11]</sup>一文从时局出发，比较了金世宗与宋孝宗的治国得失。

有关金世宗大定年间局势的整体叙说，学界亦有不少讨论。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sup>[12]</sup>指出，金世宗统治时期，正处于女真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折阶段；李锡厚<sup>[13]</sup>虽沿用了“大定之治”的提法，然却又指出，世宗的统治因被旧史书过分美化，故其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那样辉煌。李桂芝《辽金简史》<sup>[14]</sup>称世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完颜亮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政策，发展完颜亮的改革成果，最终使金朝走向发展生产和政治治理的正常轨道；楼旭青《“大定之治”何以出现？》一文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等方面，探讨了世宗朝治世的原因。此外，王永年的《金上京史话》<sup>[15]</sup>、刘肃勇的《金世宗传》、虞云国的《细说宋朝》<sup>[16]</sup>等作品中亦有对世宗朝整体情况的探讨。

21世纪以来，由于范式转换和研究旨趣的改变，很少有学者再对金世宗其人及其时代进行整体评说，而逐渐将视野转向更为精细的议题之中。

### 3. 以历史事件和现象为中心的考察

金世宗完颜雍因发动辽阳政变（又称“东京兵变”）而顺利称帝，此事件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日本学者外山军治<sup>[17]</sup>较早地注意到世宗即位离不开辽阳渤海人的支持；刘肃勇《金世宗辽阳称帝及其谋士班底》<sup>[18]</sup>认为，世宗称帝的阶级基础是渤海势家望族和熟女真的权贵、武将，以及这两个集团中的代表人物组成的谋士群体；李锡厚认为，该政变虽由完颜雍发动，但主力却是“从南方前线归来的辽东地区的士兵”，而北方的契丹起义军“正是世宗客观上的同盟者”<sup>[19]</sup>；都兴智《试论辽阳政变及辽东渤海人》<sup>[20]</sup>及张君弘《论贞懿皇后、金世宗与辽阳政变》<sup>[21]</sup>两文，据相关史料分析了辽阳政变的始末缘由，并称政变能够发动，与完颜雍母贞懿皇后李洪愿及渤海世族的支持不无关系，邸海林《“圆明大师”李洪愿与金世宗登基的关联性》<sup>[22]</sup>一文亦有类似看法；俞豁然、肖忠纯的《金世宗“潜邸”旧臣对世宗、章宗二朝的影响——以世宗即位辽阳为中心》<sup>[23]</sup>探讨了金世宗的“潜邸”旧臣，帮助其顺利即位、返回中都及稳定统治所发挥的作用；王甜《金代东京路军政事件研究》<sup>[24]</sup>一文叙及完颜雍在东京的成就及其政治影响。

海陵王完颜亮曾大肆杀戮宗室，然完颜雍却未曾遭遇毒手，原因较为复杂，董四礼《金世宗参与海陵王弑君夺权史事考》<sup>[25]</sup>一文认为，世宗参与海陵夺权活动，至少是海陵夺权的支持者，这便为后来完颜雍发动政变、反对海陵创造了条件。世宗即位后，积极派兵镇压契丹人移刺窝斡起义军，来保障政局稳定。然而，世宗大定年间社会动乱频发，清代赵翼便曾发出“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sup>[26]</sup>的疑问。关于大定之世“偏多乱民”现象之究竟，范文澜、尚钺沿袭清人赵翼观点，华山<sup>[27]</sup>则认为，乱民“独多”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李锡厚、白滨<sup>[28]</sup>的解释是，海陵王及其他朝修起居注多有不实处，因而显得世宗朝乱民记载尤多；刘施伟《试论金世宗时期的杂税与社会动乱频发的关系》<sup>[29]</sup>指出大定年间各项杂税加剧了动乱的产生。

世宗朝“偏多乱民”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史书编纂层面的问题。周经《金世宗本纪为何详尽及其他》<sup>[30]</sup>一文叙及世宗朝史官不回避政务的制度，这导致世宗本纪所载帝纪及行状最为详尽，以致于其中的“嘉谟懿训”之言甚至超过《贞观政要》；吴怀祺《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sup>[31]</sup>亦提到世宗提倡以实录的精神修史，倡导直笔、反对曲笔，注重以史为鉴；辛更儒《金世宗诋毁海陵帝诸说辨》<sup>[32]</sup>指出后世对海陵王的恶评，均出自世宗罗织。

与《金史》纂修相关的另一议题是世宗的“好道术”。周思成《“金世宗好道术”问题考实》<sup>[33]</sup>一文指出,《世宗实录》被过度美化,事实上,世宗统治初期即对神仙道术颇加留意,晚年更是醉心于本命、释道之说,对新兴宗教也是一边拉拢一边打压。

除道教外,世宗对待佛教,亦是扶植与抑制并举。王娇《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毁佛寺考——兼论金代佛教政策对佛教建筑的影响》<sup>[34]</sup>考察了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毁坏佛寺一事,认为金朝官方对待佛教主要出于利用目的。

为挽救女真旧俗,世宗曾做出许多努力,刘肃勇《论金世宗出巡上京》<sup>[35]</sup>一文指出,世宗北巡上京之举目的是希望有所建树,但随着太子的意外逝世,世宗匆匆结束了此次北巡,结果只能是一无所成;徐秉渝《金世宗时期女真民族的危机——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sup>[36]</sup>指出,世宗要凝聚起一个以全女真民族为范畴的族群认同,与找到能够有效地联结所有女真人力量的组织方式,是在内外交攻下发展出来的应变方法;张鹏《重塑空间与记忆——〈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sup>[37]</sup>一文指出,世宗树碑立传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女真旧风的活跃度。

除以上论述外,刘浦江《金世宗名字考略》<sup>[38]</sup>和冯先思《金世宗初讳考》<sup>[39]</sup>、《金世宗改名辨析》<sup>[40]</sup>等文,考察了世宗的名讳问题。邓子聪《金世宗朝储位之争新探》<sup>[41]</sup>一文,在董四礼《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刘浦江《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等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世宗朝长达十余年的储位之争以允恭胜利告终,是世宗坚持嫡长子继承制、石琚等朝臣对允恭的坚决支持以及允恭对其父女真文化政策的认同与迎合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王宏志《金世宗与“隆兴和议”》<sup>[42]</sup>探讨了“隆兴和议”签订前后的金宋关系;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sup>[43]</sup>中有对世宗的中国正统帝王意识及其特色的剖析;符海朝《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探析》<sup>[44]</sup>一文分析了幽云地区上层汉人的“诡随”行为,作者指出,这一“极端”行为的出现,既和辽、宋、金激烈争夺下幽云地区燕人上层的选择有关,又和海陵时期金朝恶劣政治生态所导致的燕人上层的表现有关,也与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差异有关,同时作者还指出,“诡随”之说未必全面、客观;李兴武《从“顺昌之战”到“大定之治”——金世宗的人生嬗变与金代顺昌府(颍州)的恢复与重建》<sup>[45]</sup>一文,论述了金宋顺昌之战对世宗生平的影响;周红冰《金代山东地区“蝗不入境”神话的兴起与消退》<sup>[46]</sup>讨论了世宗、章宗朝山东地区“蝗不入境”的现象及其成因;何冠环《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元年

宋金秦陇之役新考》<sup>[47]</sup>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石刻新出文献,对宋金秦陇之役重新进行考述。

#### 4. 对大定“治世”的专题研究

世宗完颜雍辽阳称帝后,并未大肆杀戮海陵旧臣,反而极力劝其归服,使之为新朝服务,可以凸显其极重视人才。世宗独特的用人政策和思想,学者颇有关注。高寿仙《浅谈金世宗的用人思想》<sup>[48]</sup>指出,世宗不以己之好恶、不循资历贵近用人,注重考察官员政绩;景爱《论金世宗的用人政策》<sup>[49]</sup>以举贤能、量才用、明赏罚、禁党与、用年轻等方面来归纳世宗的用人政策和特点;朱耀廷《谈金世宗的用人政策》<sup>[50]</sup>称世宗注意争取旧臣支持、起用优秀奖帅、改革学校科举以育才选士、打破资历条格并鼓励荐贤举善;隋喜文《金世宗的人才思想》<sup>[51]</sup>提到世宗思贤若渴、不次擢用贤才、注重提拔壮年人才的思想;程妮娜《论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政策》<sup>[52]</sup>论述了大定、明昌时期宰执大臣以女真为主、重视文人和依靠皇亲国戚的用人政策;其余如李琦《金世宗的用人政策浅析》<sup>[53]</sup>、周鲲《论金世宗的纳谏与用人》<sup>[54]</sup>等文也讨论了世宗的用人之道。

除任用贤才外,金世宗格外注重整顿吏治和对官员的管理,学界对此也多有研究。付百臣《略论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与举措》<sup>[55]</sup>谈及世宗坚持以政绩考核官吏、强化对官员的监督与管理、治吏用中典的吏治主张和具体实践;王德朋《金世宗吏治思想与金中叶的小康局面》<sup>[56]</sup>指出,任人唯贤与注重选拔基层官吏分别是世宗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突出特色。管理官吏乃至治理国家,相应的法律必不可缺。张志勇、孙振江《论金世宗的法律思想与实践》<sup>[57]</sup>;从法律变革、宽政、以法治吏、崇简禁奢和禁滥捕滥猎等方面论述了世宗的法律思想及其实践;张维慎、周五龙《略论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sup>[58]</sup>一文提到世宗采取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官吏管理措施;孙振江的《论金世宗的法治思想与实践》<sup>[59]</sup>、张志勇和陈振斌的《论金世宗的法律思想》<sup>[60]</sup>等文亦有类似阐述。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金世宗也做了许多工作。张博泉《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sup>[61]</sup>认为世宗朝开始局部解放奴婢;赵光远《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sup>[62]</sup>指出,世宗时期推行的通检推排,实际上是把唐、宋的两税法和划分户等的方法接收过来并稍加改造而已,不过,作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政策施行的积极意义;张博泉《金代女真“牛头地”问题研

究》<sup>[63]</sup>指出，世宗时确定的的物力钱征收制度，适应了女真族社会内部发展变化的要求；董克昌《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sup>[64]</sup>提到世宗在“保境”的基础上，主张增加劳动力、免役、减役租、赈灾、禁止官吏及士兵扰民、限制兴建寺院，最终使得人口和垦田数量不断增长；刘肃勇《试论金世宗恢复北方农业经济的措施》<sup>[65]</sup>提到，为恢复海陵以来北方地区严重的经济倒退，采取恤民赈灾、恢复农耕生业、保护耕牛、治理洪水、广积钱粮等措施，最终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周鼎初、徐德龙《金世宗“宇内小康”道路试探》<sup>[66]</sup>称世宗朝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发展北方经济，并实现“宇内小康”，关键在于限制奴隶制度、大力发展封建生产方式；黄澄《金世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sup>[67]</sup>提到世宗禁止私铸铜镜、官府大力搜求铜矿、成立专门铸钱机构等措施及其收效；林利《小议金世宗为君之道——从金世宗时期的赈济措施谈起》<sup>[68]</sup>全面地论述了世宗实行的赈济救灾措施及其成效；贾淑荣《试论金世宗时期临潢府(路)经济发展的动因》<sup>[69]</sup>一文指出，临潢府(路)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休养生息的裕民政策、稳定的和平环境、适宜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军事要塞。

治国离不开施政理念和统治思想的指导，张博泉《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sup>[70]</sup>指出金世宗秉持中庸思想，接受了中原历朝盛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天德”，同时，世宗不忘女真先朝所行事和旧俗，这是其保守思想形成的基础；靳华《史鉴对金世宗施政的影响》<sup>[71]</sup>讨论了历史经验教训对世宗施政理念的多重影响；张志勇《论金世宗以“宽仁”治国的思想（上）（下）》<sup>[72]</sup>指出世宗注意借鉴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形成了“宽仁”的治国思想；葛洪源《金世宗道德建设思想述论》<sup>[73]</sup>指出世宗熟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古代皇帝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经验，重视道德建设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张志勇《论金世宗以俭治国的思想与实践》<sup>[74]</sup>论及世宗以俭治国思想的成因、措施及其成效；吴凤霞《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sup>[75]</sup>提到，金世宗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的形成源于他对历史上君主理政的反思，具体而言，世宗渴求达到君主虚心受谏、臣下直言进谏的局面，希望宰相辅助他求得贤才；吴凤霞《金代海陵王、金世宗治国理政的路径与效果探析》<sup>[76]</sup>一文比较了海陵王和世宗治国理政的不同路径，作者指出，相较海陵“大兵大役”的治国路径，世宗所追求的是“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sup>[77]</sup>的内外无事局面；孙凌晨、罗丹丹《试论金世宗时期的道德教化》<sup>[78]</sup>一文指出，世宗

尤其重视对国人进行道德教化，其主要思想是宽仁和节俭。

金世宗统治时期，竭力维护女真传统、恢复女真旧俗，三上次男和陶晋生曾分别提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sup>[79]</sup>与“女真本土化运动”<sup>[80]</sup>之说，此后遂引发学界关于女真本位文化与汉文化的讨论。郑传斌《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sup>[81]</sup>一文指出，世宗保持“民族习惯”并不等于其抱有“民族偏见”，世宗意欲恢复女真的“纯实之风”<sup>[82]</sup>，目的是借此来笼络女真上层贵族、使人民安分守己，以巩固自身统治；王久宇《金世宗以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述评》<sup>[83]</sup>指出，世宗实行重用女真人，亲近渤海人，同化契丹人，剥夺和镇压汉族人，防范和屠杀蒙古人的民族政策，并对这一政策提出评价；王对萍《论金世宗挽救女真传统的措施》<sup>[84]</sup>提到，世宗为遏止女真的汉化趋势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仍有重大意义；王久宇《论金世宗制订“以女真为本”政策的历史前提》<sup>[85]</sup>认为，世宗之所以推行“女真为本”的政策，一是基于女真入主中原后不断汉化的客观形势，二是对海陵王汉化政策进行矫正的政治需要，三是世宗在民族情感上的主观动因；肖瑶《金世宗在汉文化与女真旧俗的冲撞与融合中的态度与政策问题》<sup>[86]</sup>指出，世宗本人既深受汉文化影响，并依此来制定治国方略，同时又不忘女真旧俗的恢复，在其看似矛盾的心理当中，可以看到其政策的合理性与统一性；刘肃勇《金世宗对金源故地的经略》<sup>[87]</sup>一文指出，为恢复女真族勇武传统，世宗在金源故地实行全民习武运动，使金源地区的秩序得以稳定；刘美云、许宏芝《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sup>[88]</sup>指出，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

除上述成果外，刘肃勇《论金世宗分相权》<sup>[89]</sup>一文主要讨论世宗朝的君相问题，作者还分析了世宗的分相权之策及其成效；王宏志《略论金世宗的宗教政策》<sup>[90]</sup>一文对世宗早年间信奉佛、道，至即位后限制佛、道的相关表现及原因有所论述；兰婷、王晖《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sup>[91]</sup>一文围绕女真贵族教育、汉文化教育和女真旧俗教育等层面，全面论述了世宗的教育思想；周峰《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sup>[92]</sup>讨论了世宗时期的对丽关系，作者指出，世宗在维持藩属关系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干涉高丽内政；赵永春《金世宗对宋和议述论》<sup>[93]</sup>论及世宗力主和议，终使金宋两国获得双赢；刘肃勇《金世宗南交赵宋北攻鞑靼的安边保境策》<sup>[94]</sup>指出，金世宗主张施行“减丁战”，修筑边堡界壕，作持久防御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

延缓了日后蒙古灭金的历史进程。宋立恒、迟浩然、陈昭慧的《金莲川在金世宗时期的行宫地位》<sup>[195]</sup>一文称,金莲川一直是世宗处理国家政务的重要场所,但后来得以终止,究其原因,这与世宗晚年施政中心的转移以及其年老体衰有关。王雪阳《海陵、世宗时期的权力结构演进——以官僚为线索的考察》指出,海陵王和世宗时期的政权转型,实际上是向传统中原王朝政权模式的转变。<sup>[196]</sup>

## 5. 结语

综上所述,学界有关金世宗及其时代的探讨,大体呈现出全面而不深入的研究特点。所谓“全面”,是指在世宗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各领域,均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问世;而“不深入”,则体现在诸多成果的叙述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质化”倾向。具体说来:其一,部分研究难以挣脱以汉族中原王朝视角来观察大定之世的束缚,以致难以展现出金朝独特的治理体系与思路;其二,部分研究未能从传统史籍的叙述框架中抽离,所得结论大而化之,具体论证则往往受到“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其三,对史书中的基本表述和学界已有观点,较少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并缺乏对相关史料进行深入而必要的批判和再阐释。当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评述,可以发掘“大定之治”在金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为中国古代北族王朝的“治世”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 References

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1986).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2.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2013).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
3. 杨启(1982).略论金世宗.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88-96.
4. 王宏志(1984).金世宗的历史地位.文史知识,(4),15-20.
5. 刘肃勇(1986).金世宗传.中华书局.
6. 辽宁省博物馆(编)(2010).辽宁省博物馆馆刊.辽海出版社.
7. 朱子方(1990).金世宗简论.东北地方史研究,(2),29-39.
8. 董克昌(1990).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2),60-67.
9. 汪冰凌(1990).金世宗其人及其传说.北方民族,(1),88-91.
10. 王德忠(1992).也论金世宗的历史地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3-49.
11. 王德忠(1999).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史学月刊,(6),37-42.
12. 乔幼梅(1995).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
13. 周远廉(主编),李锡厚(著)(1996).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4. 李桂芝(1996).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5. 王永年(编著)(2016).金上京史话.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6. 虞云国(2002).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
17. 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编)(1941).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京都内外出版社.
18. 刘肃勇(1983).金世宗辽阳称帝及其谋士班底.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3-79.
19. 周远廉(主编),李锡厚(著)(1996).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20. 都兴智(2007).试论辽阳政变及辽东渤海人.文化学刊,(4),154-160.
21.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宁省博物馆(编)(2013).辽金历史与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
22. 邱海林(2013).“圆明大师”李洪愿与金世宗登基的关联性.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2-64.
23. 俞豁然、肖忠纯(2013).金世宗“潜邸”旧臣对世宗、章宗二朝的影响——以世宗即位辽阳为中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3),66-69.
24. 王甜(2019).金代东京路军政事件研究.渤海大学硕士论文,18-23.
25. 董四礼(2009).金世宗参与海陵王弑君夺权史事考.北方文物,(3),76-78.
26.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2013).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
27. 华山(1956).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北方文物,(11),63-67.
28. 李锡厚、白滨(2016).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9. 刘施伟(2023).试论金世宗时期的杂税与社会动乱频发的关系.通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12-18.
30. 周经(1988).金世宗本纪为何详尽及其他.档案,(1),16-17.
31. 吴怀祺(1996).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史学史研究,(2),1-7.
32. 辛更儒(1999).金世宗诋毁海陵帝诸说辨.学习与探索,(2),141-143.
33. 周思成(2012).金金世宗好道术”问题考实.史学史研究,(1),63-71.
34. 王峭(2020).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毁佛寺考——兼论金

- 代佛教政策对佛教建筑的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2),150-155.
35. 刘肃勇(1986).论金世宗出巡上京.北方文物,(3),55-60.
36. 徐秉渝(2001).金世宗时期女真民族的危机——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汉学研究,19(2),249-279.
37. 张鹏(2020).重塑空间与记忆——《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美术研究,(1),27-32.
38. 刘浦江(2017).宋辽金史论集.中华书局.
39. 冯先思(2015).金世宗初讳考.中华文史论丛,(4),266.
40. 纪宗安、马建春(主编),李锡厚(著)(2017).暨南史学(第1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1. 邓子聪(2022).金世宗朝储位之争新探.西部学刊,(23),63-66.
42. 陈述(主编)(2017).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43. 熊鸣琴(2017).金人“中国”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44. 符海朝(2016).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探析.兰州学刊,(7),68-77.
45. 李兴武(2017).从“顺昌之战”到“大定之治”——金世宗的人生嬗变与金代顺昌府(颍州)的恢复与重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25-31.
46. 周红冰(2019).金代山东地区“蝗不入境”神话的兴起与消退.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4),65-71.
47.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文化研究中心(编)(2020).宋代文化研究(第27辑).线装书局.
48. 高寿仙(1985).浅谈金世宗的用人思想.党校教学,(6),35-36.
49. 景爱(1987).论金世宗的用人政策.北方文物,(3),71-77.
50. 朱耀廷(1988).谈金世宗的用人政策.社会科学辑刊,(6),86-90.
51. 隋喜文(1984).金世宗的人才思想.北京社会科学,(2),55-59.
52. 程妮娜(1988).论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政策.史学集刊,(1),19-25.
53. 李琦(2010).金世宗的用人政策浅析.黑龙江史志,(6),29-31.
54. 周鲲(2015).论金世宗的纳谏与用人.西部学刊,(13),23.
55. 付百臣(2005).略论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与举措.社会科学战线,(4),206-212.
56. 王德朋(2007).金世宗吏治思想与金中叶的小康局面.文史杂志,(1),53-54.
57.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宁省博物馆(编)(2010).辽金历史与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
58. 张维慎、周五龙(2004).略论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28-31.
59. 孙振江(2010).论金世宗的法治思想与实践.政法论坛,(5),89-93.
60. 张志勇、陈振斌(2006).论金世宗的法律思想与实践.东北史地,(1),142-148.
61. 张博泉(1965).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史学月刊,(9),37-42.
62. 赵光远(2022).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7-104.
63. 张博泉(1981).金代女真“牛头地”问题研究.历史研究,(4),149-159.
64. 董克昌(1985).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北方文物,(2),62-68.
65. 刘肃勇(1987).试论金世宗恢复北方农业经济的措施.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4),66.
66. 周鼎初、徐德龙(1999).金世宗“宇内小康”道路试探.咸宁师专学报,(23),50-56.
67. 黄澄(2007).金世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西部学刊,(11),17-18.
68.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宁省博物馆(编)(2009).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69. 贾淑荣(2011).试论金世宗时期临潢府(路)经济发展的动因.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9-32.
70. 张博泉(1983).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黑龙江文物丛刊,(3),1-10.
71. 靳华(1997).史鉴对金世宗施政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2),91-94.
72. 张志勇(2005).论金世宗以“宽仁”治国的思想.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2-3),209-211+304-306.
73. 葛洪源(2002).金世宗道德建设思想述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0(11),46-48.
74. 张志勇(2008).论金世宗以俭治国的思想与实践.东北史地,(4),72-76.
75. 吴凤霞(2012).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史学集刊,(6),98-103.
76. 吴凤霞(2017).金代海陵王、金世宗治国理政的路径与效果探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572-581.
77. (元)脱脱(2022).金史.中华书局.
78. 孙凌晨、罗丹丹(2019).试论金世宗时期的道德教化.北方文物,(2),97-101.
79. (日)三上次男(1973).金史研究(第3卷).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80. 陶晋生(2003).女真史论.稻香出版社.

81. 郑传斌(1996).金代海陵王、金世宗治国理政的路径与效果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3-77.
82. 元)脱脱(2022).金史.中华书局.
83. 王久宇(2007).金世宗以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述评.黑龙江史志,(10),25-26.
84. 王对萍(2010).论金世宗挽救女真传统的措施.沈阳大学学报,(2),87-90.
85. 王久宇(2008).论金世宗制订“以女真为本”政策的历史前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41-43.
86. 肖瑶(2008).金世宗在汉文化与女真旧俗的冲撞与融合中的态度与政策问题.继续教育研究,(4),156-158.
87. 刘肃勇(2009).金世宗对金源故地的经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113-115.
88. 刘美云、许宏芝(2015).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8-30.
89. 刘肃勇(1988).论金世宗分相权.社会科学辑刊,(3),75-77.
90.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编)(1989).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期).文物出版社.
91. 兰婷、王晖(2004).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109-111.
92. 周峰(2004).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当代韩国,(4),30-33.
93. 赵永春(2008).金世宗对宋和议述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9-25.
94. 刘肃勇(2013).金世宗南交赵宋北攻鞑靼的安边保境策.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771-774.
95. 中国古都学会(编)(2017).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6. 王雪阳(2024).海陵、世宗时期的权力结构演进——以官僚为线索的考察.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68.